

WODE DIDI "XIAOLUOBOTOU"

我的弟弟“小萝卜头”



少年

社

我的弟弟“小萝卜头”

本社编

少年儿童出版社

我的弟弟“小萝卜头”

本社编

桑懿康 插图

责任编辑 郑开慧 技术编辑 杨林炳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印张 3
邮政编码 200052	字数 52,00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1998 年 3 月第 3 次印刷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印数 58,001-63,500

ISBN 7-5324-3155-X / I · 1341 (儿) 定价: 3.00 元

历史不可淡忘

——代序

鲁 兵

历史不可淡忘，革命历史更不可淡忘。

你们是九十年代的少年，视野开阔，思想敏锐，这是五十年代少年（有的已可做你们的父辈）所不及的，可是你们也有所缺，你们中间有不少人不大知道或全不知道：是革命先辈从昨天的中国杀出一条血路，才有今天的中国，而他们许许多多就在这条血路上倒下了；不大知道或全不知道昨天的中国如何贫穷，经过四十年的奋斗，已向前跨了一大步，但不可能“一步登天”。建设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正需要你们像革命先辈那样作坚苦卓绝的奋斗。

不大知道或者全不知道，都无可责备；应该受到责备的是我们这些大人，多年来忽略了向你们讲历史，讲革命传统。有的人甚至通过文学作品向你们贩卖以舍己救人为愚蠢的庸人哲学。

课堂之外，向你们讲历史，讲革命传统，无疑应当真实而生动感人。《我的弟弟“小萝卜头”》就是这样一本书。

这本书收入两篇真实的故事。

《我的弟弟小萝卜头》里的小萝卜头名叫宋振中，他还是个婴儿时，就跟父亲宋绮云烈士母亲徐林侠烈士一起进了监狱，解放前夕又和父母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这篇作品是小萝卜头的二姐写的。看看小萝卜头是怎样在狱中学习和跟着父辈斗争的。

《和爸爸一起坐牢的日子》，作者卢大容，写这篇作品时十八岁，现在已五十三岁了。他的父亲卢志英，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曾在苏北担任联合抗日部队副司令员，一九四二年以后做地下工作，一九四七年不幸被捕，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反动派活埋在南京雨花台。卢志英烈士被捕时，卢大容才十一岁，他和母亲也一起进了牢房。这篇作品所写的，就是他所见到的残酷的迫害和英勇的斗争。

开此卷，必有益。你们将从这本书里见到那时和你们年龄相仿的人，见到那时的许多长者，从他们身上获得巨大的力量，坚定的信心，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

目 录

历史不可淡忘(代序) 鲁 兵(1)

我的弟弟“小萝卜头” 宋振苏(1)

和爸爸一起坐牢的日子 卢大容(37)

我的弟弟“小萝卜头”

宋振苏

我的父亲宋绮云,母亲徐林侠,小弟弟宋振中,他们都是在重庆解放前夕,和杨虎城将军一起,被“中美合作所”^①的美蒋特务秘密杀害的。关于“中美合作所”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和许多革命先烈在集中营里所进行的英勇斗争,小说《红岩》已作了生动的描述,书中也提到了杨虎城将军和我的父母,并且写到被人叫作“小萝卜头”的振中弟弟。但他们被特务杀害的经过,《红岩》里没有正面叙述。全国解放后,我们才从各方面了解到他们遇害的情况。

在一九四九年重庆解放前夕,敌人面临死亡的时刻,反动的蒋介石亲自安排了杀害杨虎城将军一家和我父母、小弟弟的罪恶计划。据特务们供认,在蒋介石要他们下毒手的时候,有个特务曾问过:“那两个孩子怎么样……”(指的就是振中弟弟和杨虎城将军的小女儿)他的话还没有说完,蒋介石就把桌子一拍说:“留下干什么!”

当年九月六日晚上十一点钟,杨虎城将军和他的儿子

① “中美合作所”是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简称。这是反动的蒋介石和卖国主义为了监禁和杀害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联合组织起来的国际性特务机构。



在前，我的父母、小弟弟以及杨家的小女儿在后，一起从贵阳被押解到重庆。当时特务们骗他们说：“现在时局不稳，准备把你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到重庆等飞机。”但当杨将军父子刚走进“中美合作所”内的“戴公祠”^①的时候，就被预先埋伏在那儿的特务，用尖刀刺死了。没有人性的刽子手从杨将军父

子身上拔出血淋淋的尖刀，杀气腾腾地闯进了临时监禁我父母的小屋子里。当时我父母在路上走得很累，刚坐下休息，振中弟弟和杨家小女儿在一起玩。我父母看到刽子手们的狰狞面目，知道敌人要下毒手。母亲便向特务们说：“我们既已落在你们手里，就不怕死。可决不许你们伤害这两个孩子！”没有半点人性的凶手，一言不发地向我父母进逼，抢上去劈胸就是几刀。两个孩子看到这种凶杀惨象，吓得哇一声哭了起来，紧紧地搂在一起。当时，凶手们一边连续不断地用刀刺杀着我的父母，一边还厉声向孩子喊：“不许哭！”两个孩子搂抱得更紧了。当凶手们从我父母身上拔出

^① 蒋介石在“中美合作所”内的别墅，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死后，改为“戴公祠”。

尖刀，逼向两个孩子的时候，两个孩子扑向我父母身边，寻求保护。但是，那两个灭绝人性的畜生，恶狠狠地从背部给小姑娘一刀。小弟弟抱起了躺在血泊中的小伙伴，还想拉她躲避，这时特务已经举着刀向他刺来了。他高声喊：

“我不要死，我要活，我要出去！……”

可是刽子手们比野兽还凶残，两个幼小的孩子，都被他们杀害了。当时我母亲倒在地上，还没有断气。刽子手有意让她看着自己的儿子和那小女孩一起惨遭杀害。那时我母亲的嗓子已发不出声音，她睁着极端愤怒的眼睛，紧紧地咬着牙齿。刽子手杀死了两个孩子以后，又在我母亲身上补了几刀。

写到这里，仇恨充满了我的胸膛，同时也想起了亲人们生前的许多事情。二十二年前，我的父亲在西安做党的秘密工作，由于白色恐怖，我们全家在西安无法住下去。为了避开敌人的追踪，便于开展工作，父亲就把我们全家隐蔽在西安西南郊的蒲阳村。在这个村庄里发生的事情，我父母和小弟弟被捕的情景，就像刚刚发生的一样，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我永远也忘不了父亲的身影

那是一九四一年秋天的一个上午，我爸爸被捕了。当时我妈妈正在斜对门老乡家帮忙剥玉米，她听到这消息，想

了一下，就抱起振中小弟弟，拉着我往家走。我们刚走到大门口，就看见爸爸已经被几个便衣特务围着，从家里走出来，正和我们打个照面。这时爸爸还穿着拖鞋，大弟弟振华从后边追上去，送给爸爸一双出门时穿的鞋。我和妈妈一直站在街对面。在爸爸换鞋的时候，我想，不能让他们把爸爸带走，想脱开妈妈的手，扑上去抱住爸爸，却被妈妈用力拉住了。我回过头望了望妈妈，她两眼含泪，射出愤怒的目光。妈妈看了我一眼，好像在说：“别去，孩子，爸爸会伤心的。”我只好抱住妈妈的腿，眼巴巴地望着爸爸。在特务们的催促下，爸爸穿好了鞋，只是向妈妈示意地看了一眼，什么也没来得及说，就被特务带走了。我看到爸爸要被带走，忍不住大声哭了起来，向爸爸扑去。两个特务拦住了我，不允许我靠近爸爸一步。

就这样，爸爸终于被特务抓走了。他被捕时那健壮的身躯，从容镇静的样子，和被特务围着稳步走去的身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永远也忘不了。

我父亲的一生，是为革命战斗的一生。他出生在江苏邳[pī]县杲[gǎo]堂村的一个贫农的家里。我的祖父和伯伯、姑母们都是种田的。父亲是祖父母最小的儿子。他自幼勤奋好学，在读小学时就很会讲演，口才很好，祖父母很疼爱他。祖父母为了想让家里有一个读书的人，幻想着这样也许可以少受人欺侮，就含辛茹苦地积攒每一文钱，供他读书。

一九二五年，父亲在省立清江师范毕业，看到当时军

阔混战、社会腐败、地主残酷剥削农民，并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从十九岁起就参加了革命斗争。

一九二七年春，他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党，交给了无产阶级伟大的革命事业。他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为革命事业战斗。在“西安事变”前，他公开的职务是西安《西北文化日报》的社长。

他担任《西北文化日报》社长有六七年的时间。由于地下党组织做了工作，并在我父亲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把当时的《西北文化日报》办成了一张倾向进步的报纸。它主张团结抗日，反对独裁内战。“西安事变”一发生，它及时地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报社还印发了许多宣传品。国民党反动派就把它视为眼中钉，时常用“新闻检查”的手段来迫害它。但国民党反动派越是迫害它，群众却越是爱读它。我父亲他们为了同敌人进行斗争，有时明知这篇文章不会让发表的，就故意把印报的纸版推迟时间才送去给反动派的检查机关看。反动派不同意登，他们就当场用锤子把那篇稿子的纸版砸几下，原样印出去，这样就能使读者从模糊不清的版面上读到这篇文章的大意。为了使当时的革命圣地延安的印刷出版工作搞得更好，他和几个同志一起想办法从上海购买了一部新印刷机和许多铅字，连同报社里的一部分机器和铅字，费了三个夜晚，从报社里偷偷搬出来，然后派人秘密送往延安。当时，我父亲还秘密动员了十几个印刷工人，前往延安工作。办了这件事之后，反动派发觉了，父亲费了很大周折，才摆脱了敌人的追查。我父亲平时

工作很忙，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记得“西安事变”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全家都焦急地等着他回家吃饭，等了很久不见回来。妈妈不放心，就让我与振平姐到报社去找他。我们跑到爸爸的办公室里，看到他正伏在桌子上写东西，眼睛都熬红了。他听见我们叫他，才抬起头来，把我们拉在怀里，慈祥地看了我们很久，才说：“爸爸今天有事，不能回家吃饭了。你们快回去吧！”就在这天夜里，报社竟被特务放火烧了，爸爸和很多工人都从窗口跳出来，才脱了险。

我父亲对同志有深厚的阶级感情。当时我们家里经常住着从事革命工作的叔叔、伯伯，父亲和母亲总是非常热心地照顾他们。他把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当成自己的阶级兄弟，自己生活很俭朴，经常省下钱来帮助他们。我父亲年轻时曾花了几年时间，从一对老夫妇那里学到了一个根治淋巴结核的秘方。他就常常配了药，免费给阶级兄弟治病，疗效很好。

当时，我们这些天真的孩子，只晓得父亲是个好爸爸，我们很爱他。他因为工作忙，难得回家一次，回家来也总是工作到深夜，所以和他相处在一起是我们最欢乐的时候。这时候，爸爸就给我们讲故事。我们最爱听他讲八路军打日本鬼子、捉汉奸的故事。他还教我们唱歌，唱的大多是抗日歌曲。我们最喜欢跟着他一起唱《在太行山上》那支歌：

红日照遍了东方，
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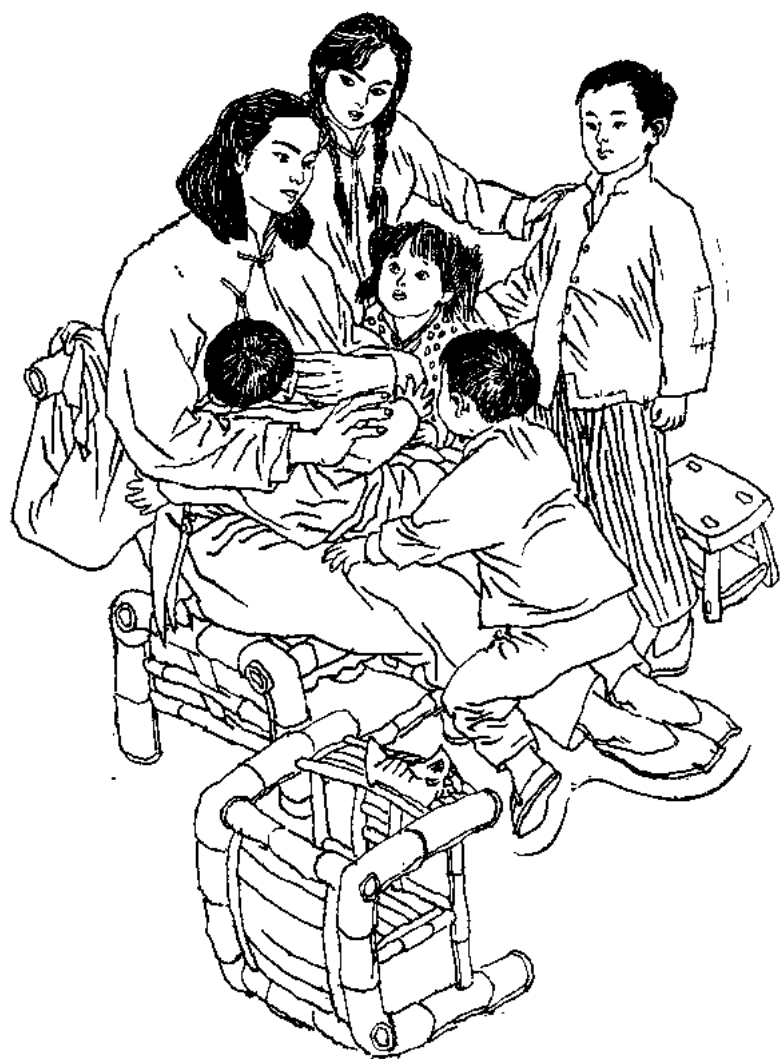
爸爸被捕后，我们天天都盼着他回来，可是万万没有想到，那次和爸爸在蒲阳村的分离，竟成了终生的永别。

失去了亲爱的妈妈和小弟弟

万恶的反动派，抓走了我的父亲还不算，又要了一个阴谋，抓走了我的母亲和小弟弟。那是在父亲被捕两个月后的一个下午，一个从不相识的人到我们家来，他自己说他是一个工人，我父亲曾经救济过他，为了报恩，这次偷偷替我父亲送信来的。这人一再嘱咐我母亲亲自去一趟。

爸爸走了两个月，我们一直没有打听到他的消息，现在好不容易有了消息，妈妈要看看爸爸的心情是很迫切的。当时，妈妈看了信，说是爸爸要衣服，她就马上动手收拾了几件衣服，打算带我和小弟弟进城。她准备让我照看小弟弟，自己去设法营救爸爸。同院的老乡很关心我们，他们听到这个消息，纷纷跑来劝我妈妈说：“是凶是吉，还不知道，带了一大一小两个孩子去怎么行呢！”这样，妈妈才改变了主意，决定只抱着正在吃奶的小弟弟去，不带我去。现在想来，如果我去了，不也同样要遭到敌人的监禁和屠杀吗！

当天因为天黑了，妈妈没有进城。晚上，我们四个孩子坐在她周围，直望着闷闷不乐的妈妈。



我悄悄地问她：“爸爸能回来吗？”

妈妈说：“爸爸会回来的。他是为了救中国，为了叫人民过好日子，反动派才捉他。爸爸是没有罪的。孩子！”

妈妈说，强忍住快要涌出来的泪水。她照顾我们睡下后，又忙着为我们缝补换洗的衣服，最后又拿起了几天来一直为我绣的一只枕头，不停地抽线。屋子里又黑又静，我听见妈妈的抽泣声。妈妈低着头，一针针一线线地绣着枕头。在这只枕头上，绣进了母亲的心，绣进了母亲的泪。这一夜我就在妈妈轻轻的抽泣声中睡着了。第二天一清早，妈妈临走时，把我们姐弟叫到她身边说：“我进城去看爸爸，你们好好在家等着，最多三天就回来了。”

她说，又很不放心地拉起我的手说：“振苏，你最大，要好好照看弟弟妹妹。”

我也不知道这照看的担子有多么重，就只顾点头，好让妈妈放心些。我们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妈妈，心里真不想让妈妈走，可是一想到她得去营救爸爸，只好依依不舍地把妈妈送到村口。我们又站在那棵大榆树下，眼巴巴地望着妈妈抱着小弟弟走了。我记得，当时地里的玉米都收下了，有几块地里还留着一些稀稀朗朗的玉米秆子，妈妈就穿过那些玉米秆子，渐渐走远了。妈妈的身影快被桥边的矮树遮没了，可是她还不断地回头，向我们摆手，叫我们回去。我万万没有想到，妈妈和弟弟这一去，就再也不能回来了……

妈妈走后，剩下我们四个孩子，我最大也才十二岁，大弟振华八岁，二弟振镛六岁，小妹振亚才四岁。我们等着，